

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三百年 (中 篇)

——俄国对中国古代文物的收藏与研究

李明滨

俄国收藏的中国古代文献、历史资料也以彼得堡为最多。19世纪、20世纪初帝俄出于对外政策的需要,加强对华研究,派出考察队前来搜集资料,远及我国的北部、西部边陲,还进行考古挖掘,获得大批稀世文物。其中大部分藏于“亚洲博物馆”,今称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彼得堡分所。该所收藏的还有俄国外事人员、几代汉学家来华搜集或购买的古代文化典籍、图书资料。

1903年成立的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曾派出多批考察队来华,著名的有科兹洛夫队到戈壁沙漠发掘哈拉浩特古城,获得大批西夏文、汉文书籍,鄂登堡队获取大量敦煌文物。事过半个世纪,自1957年该所才组织人力进行清理,编出《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写本综录》两册,第一册收录1740件,第二册收录1211件。但据清理的结果,全部敦煌收藏品为1万二千件,包括完整的卷和残页,后又编成《敦煌发现的中国文书》四册。目前正由我国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对方合作,将其陆续影印出版。

从整理到开展研究,逐步形成了俄国的敦煌学,并出现了一批专家。著名的有孟列夫(1926年生),他从1957年起始终致力于此项工作。目前经他整理在莫斯科出版的佛教经卷已有《维摩碎金(维摩诘经变文残卷)》和《十吉祥》(1963)、《双恩记变文》(1972)、《妙法莲华经变文》(1984)等,每本都是原作全文影印,附孟氏的俄文和注释,以供对照,也便于勘考释读。孟氏还为每个变文本写了序文,分别对与变文体裁有关的问题做出论述。为《维摩诘经变文》和《十吉祥》写的序是《论变文的种类和起源》,论析了变文韵文部分的韵律。显《双恩记变文》写的序则讨论了变文的思想内容(佛教与孝道)和结构诸问题。他并以此扩展成学位论文《报恩经变文》,而于1976年获得博士学位。另一篇序《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则论述了变文的讲唱方式和讲唱人,以及变文的词汇特点。孟列夫对变文的研究是多角度的:版本学的、古字体学的、文学史的等等,他的深入程度达到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公元后一千年间的中国抄书业》。

孟列夫在整理敦煌文献中,还编出《中国敦煌写本·佛教俗文学文献》(影印敦煌赞文附宣讲,1963)和唐代诗人《王梵志佚诗集》(1989)。后者同我国张锡厚所编《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相比,多出6首佚诗,均系从敦煌残卷里辑录的,并引起日本学者川口元雄教授的注意而对该书发表多次评论。

西夏古城遗址哈拉浩特(蒙语,意为“黑城”),即“黑水城”,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1909年科兹洛夫队在那里挖掘出的黑城文物约9千余件,有从宋、辽诸国的儒、佛、道家经典,有

文牒、地契、版画、民间唱本、杂字、医书、药方、历书、算命、星相术等珍本,还有元代纸币宝钞。其中,珍本如《礼记》《论语》《汉书》《新唐书列传》《广韵》《南华真经》《六十甲子歌》《六壬秘课诀》《出典土地文》等。这批独一无二的文献,对于揭开西夏历史上许多未被人知的事实,极有参考价值,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也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例如,关于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历史资料,其中就有我国原本已佚的民间文学珍品南宋(金)时期的《刘知远诸宫调》(已是残本),以及早期木刻年画(四美图)、木刻纸马《义勇安王位》(关羽像)、《佛教三字经》等等,均系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稀世珍宝。

西夏文物经过孟列夫博士的悉心整理、著录,按佛经、古籍、小说、杂文、官方文件、药方、历书等分类,并译释成内容提要,共有37品目,已编成《哈拉浩特中国文献综录》出版。它公布的是11至14世纪的全部汉文文献,并有孟氏的序文《西夏国汉文文献》。

至于其中占主要部分的西夏文典籍,则搁置了许久,一直等到1959年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的克平来所工作之后才动手整理。她是驻华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一位领班的后裔,出生于天津,长大后回俄国,虽然学了汉学专业,但同样不懂得西夏文,因而起步还得从学西夏文入手,然后才开始整理典籍。但是她用近十年功夫就成了西夏学专家,先后写成《西夏语动词体的范畴》《西夏文〈孙子〉词汇与语法研究》等文章以及专著《西夏文语法》。后来连续整理出版了已失传的唐代小说集《类林》俄译本(并附西夏文影印本)和西夏文木刻复印本《文海》(两卷),后者系克平与人合译成俄文。还有许多资料有待于复印出版。

在埃尔米塔日等处保存的中国民间年画是几代俄国学者来华的搜集品,这同俄国学术界的民间文化意识发达有关。他们早在19世纪就重视采录民间故事、民间谚语和編集出版民间版画,并且已经形成传统。这种风气甚至扩大影响到中亚民族的学术界,即以吉尔吉斯为例,它于16世纪以前创作的英雄史诗《马纳斯》就由哈萨克民族学学者和俄国学者从19世纪中期开始记录。同样的史诗在我国克尔克孜民族中也有流传,但中国学者开始记录《马纳斯》则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晚了整一百年。

迎新春喜气洋洋,家家户户贴春联、门神和年画,是自古以来的风俗。贴年画的历史,从宋朝起就有记载。年画岁岁更新,在民间习以为常,也就不大注意保存。以往我国的博物馆,以为它是俚民俗物,对于无论是“新桃”还是“旧符”从不积极收藏。解放以后,一些旧年画甚至被当作迷信品废弃,尤其在“文革”十年时期。

反之,外国人对这种线条简练、色彩鲜艳的民间风俗画却感到新鲜,视之为有民族艺术特色的珍品。在国外的博物馆或私人家里广为收藏。笔者近年来在俄罗斯各地访问就时有所见。据调查,俄罗斯的中国年画藏品,在国外的收藏数量中占据首位。单说冬宫就有5000多幅,其他如民俗、宗教史两个博物馆,列宁格勒市图书馆,莫斯科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以及伊尔库茨克州美术博物馆、喀山大学民俗博物馆、基辅市东西方艺术博物馆、鄂木斯克市艺术博物馆等都有几十、几百、上千幅藏品。

俄国搜集中国年画始于1896和1897年,植物学家科马罗夫(后于1920年和1936年分别当选科学院院士和院长)来我国东北研究植物群系,路过吉林和沈阳市买去了三百幅。回国后还举行了“中国年画展”。那很可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次中国年画展。那批展品大多是杨柳青印刷的,其中有不少在我国已失传。如大型《红楼梦》年画:《藕香榭吃螃蟹》,画有贾

母、史湘云、王熙凤、彩云等23个姑娘和宝玉在一起(故事见小说第38回),系杨柳青盛兴画店印行的。

科马罗夫由考察中国植物,感到其种群的丰富多样,到对社会发生兴趣,对中国人产生感情。考察日记就反映出这种心态:广泛参观寺庙,对佛像、关帝塑像、地狱景象泥塑,直至杂货铺里的布匹、碗盏、爆竹、冥钞以及大蒜、蘑菇等日常食品,都一一作了记录,为俄国人了解中国的民情风俗提供情况。

另一位著名的年画搜集者是苏联汉学的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院士(1881—1951)他1906年来华进修,1907年游历华北五省: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历时五个月,搜集的民俗文化资料极为广泛:奶妈唱的摇篮曲,盲艺人的说唱,民间的传说故事,寺庙碑林的铭文、匾额、告示,孔庙里的颂词、祭文,宫殿瓦当上的吉祥纹样,有各种印刻字画的信笺等。对表现各种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和当时日常生活场面的汉画像石,都做了拓片。1912年再次来华主要考察地点在华南,了解民间的宗教信仰,在上海、厦门、汕头、广州、佛山等地搜集了年画。他两次在华搜集到的年画总数在4000至5000幅。

阿氏的特点是搜集与研究并重。早在彼得大学求学时,他就想弄清一幅梅花鹿与寿星的年画是什么意思,拿去问当年在该校任教的中国教师,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对方回答他:“这种东西俗不可耐,我不想看到它出现在高等学府里。”后来到了北京,有机会弄懂年画的含义。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一只脚赤脚,一只脚穿草鞋,意味着祈望当年风调雨顺;一只大公鸡在牡丹花丛下啼叫,意味着荣华富贵。如此的象征手法令他感到新奇,他便想请教老师逐张解看,没想到此地的老师依然鄙视它。只好以替老师翻译外文稿件为交换条件,让老师把每张年画的情节和象征意义写成文字说明。老师抱着不屑为之又不得不做的态度为其解说年画,并特地在阿氏准备的解说本封面写上这样四个大字“粗画解说”。不过他解说的四百幅年画却为阿氏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阿氏的研究大有长进,等到他来到杨柳青的年画店,已经令店主大为惊讶了。对方说:“一个懂汉语的洋人,不仅知道有年画这种东西,而且能用行话一一解说内容,真是怪事!”阿氏则满怀信心,要以此为题写学位论文。说:“这个题目越来越吸引我,何况从来还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年画呢!”他接着讲出了在当时(20世纪初)看来是很有见解的看法:“民间艺术的精华与‘高雅’艺术相通……民间艺术往往是几近完美的,年画就是一个例子。”

后来,阿列克谢耶夫写出了一系列文章,论及中国民间年画、民间戏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宗教、迷信等,死后他的门生整理编成《中国民间年画——民间画中所反映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一书出版(1966),书中附10幅年画,8幅为彩色的。

第三位收集者是当代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广泛宣传介绍年画,甚至应邀到德国、东欧、西欧、港台的一些大学里去讲学。还倡议与中国学者合作出版《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李福清、王树村、刘玉山合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首次把200多幅在中国已佚传的年画公诸于世。李福清自己也搜集年画,他在俄国境内搜购到晚清年画40幅,多数是中国已罕见的青地年画,如《长板坡》、《罗成与徐丽娘比武》(《说唐》故事),以及杨柳青年画《写经换鹅》(王羲之故事)等。

综观俄苏收藏的年画,不仅数量大,而且题材广、品种多样。民俗画如各种神像,包括门神、财神、灶神,各种风俗画如过年、结婚、喜庆、祝寿、民间游戏等(《年年有鱼》《福寿和

合》以及打牌、放风筝等)。也有美人画、年历画、山水花鸟画。有的年画题辞带有民间文学韵味,如《庄稼佬作知县,官话不通》《时兴京秧歌》《十二月斗花鼓》《老鼠自叹》等。属于民间文学题材的还有京剧、地方戏的戏曲年画,如《二进宫》等。

以小说、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年画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唐》《说岳全传》《封神演义》《红楼梦》《二度梅》《三侠五义》等。

晚清年画则有大量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为题材的,如《台湾军船图》《炮打日本国》《倭酋唾手得台北,刘义愤怒缚桦山》《刘提督生擒李威利》《法国攻北宁,刘帅获全胜》《捉拿倭俄奸审问正法》等。年画题材之广也包括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的,如《天津马路骑车》《上海图》《天主堂外国人做亲》等。

俄国引进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搜购图书。经常派专人来华,尤其依靠驻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人员进行搜购,每届使团都有人受命购书,教士团成员也尽其所能罗致。长时期内坚持不懈地把各种图书资料源源运往彼得堡。例如汉学家比丘林,系原传教士团的领班,他居留北京14年,搜集到大量文献资料。古代典籍,包括舆图,182年回国时所带文物材料重达1400磅,其中仅满、满文中国书籍就有1箱,全部文献书籍分由1只骆驼驮运。另一位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院士也是随传教士团来北京居留十年期间,竭尽全力搜罗图书资料,在1850年回去时带去汉、满、藏、蒙文书籍84种共273册。其收集书籍门类数量总是力求多而全。后来他在写作《圣彼得堡大学东方书籍简介》时曾不无自豪地说到该校图书馆满文类藏书,已经“囊括了用这种文字出版和写作的全部书籍”,“因为在清朝首都(按,北京)对满文的注意已经减弱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书商认为满文书无利可图而当作汉文书的衬纸”,甚或被弃置作其他物品的包装纸,所以花不多的钱就可以贱买到。这些仅为突出的事例。当然俄国所获图书的第三个来源是政府间的互相赠送,1845年清道光帝时就应俄国之请求,将北京雍和宫所藏佛教经典《丹珠尔经》8百余册赠之,俄方也回赠俄文图书15种。后来也每有赠予,至于苏联时期政府间赠送数量之巨,更是毋庸赘述。

所有这一切都使俄国有可能拥有大批中国古籍文物,它主要收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的图书馆。前者为“亚洲博物馆”(图书馆),藏书侧重于古代和中世纪典籍,其抄本、刻本、历史文书极多,总数达70余万册。后者为莫斯科的“汉学图书馆”,系科学院于1958年设立的汉学资料中心,规模也很大,也是刻本、石印本、旧式印刷本,直至甲骨文青铜文资料、古代珍贵文献俱备。据说该馆拥有的孤、珍本数量居全俄苏第一,不亚于国外的同类图书馆,最古的有公元516年的典籍。

俄藏中国图书之多样和珍贵,即以古典文学为例,单就《红楼梦》而言就有1820年以来从中国采集去的各种刻本,总数达60多种。更为难得的是它保存有前所未闻的一种《石头记》的抄本,于1964年在列宁格勒发现的,因而被称为“苏联列宁格勒亚洲图书馆藏本”。这为我国已有的1种《红楼梦》抄本之外,增加了第13种抄本。该书共80回,据查是于1830年由一位传教士团的成员回国时带去的。该书的发现引起国内外红学界的轰动,最近才由中华书局前去影印回来出版。